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七一期 ——
(二〇〇八年十月二十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810a)

【书刊消息】	《丁盛将军回忆录》公开出版	余汝信
【往事如烟】	一腔悲愤谁诉——记丁盛同志晚年	迟泽厚
【不平则鸣】	丁盛将军申诉书 (余汝信先生提供)	丁 盛
【当事者说】	聂元梓口述历史 (选载)	聂元梓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书刊消息】

《丁盛将军回忆录》公开出版

• 余汝信 •

由丁盛口述、金光访问记录、余汝信整理编注的《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近日在香港公开出版。

本书为根据丁盛生前于1990年代中期两次长时间谈话录音整理而成。谈话录音经金光转换成文字稿，曾于2001年自行印刷，在战友中内部传阅。受丁盛将军亲属的委托，编者近一年来对自印本进行了史实和文字上的订正，增加了一些必要的注释、记录将军一生征程的珍贵历史照片及生平大事年表等附录文字。广州军区老同志、原军区司令部动员部部长迟泽厚老人，为本书写了情深意切的《一腔悲愤谁诉——记丁盛同志晚年》一文，并对全书整理稿进行了认真的修改校阅。

丁盛文革期间曾先后担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司令员、广州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员。重新整理后的回忆录共分为十四章，其中涉及文革部分四章，分别是第十一章新疆岁月、第十一章军区司令（一）、第十二章军区司令（二）和第十三章飞来横祸。这一部分语言质朴的文字，揭露了文革中一些重大事件的内情，反映了一位为共和国立下赫赫

战功的高级将领在那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困惑与磨难。

~~~~~

## 【往事如烟】

### 一腔悲愤谁诉——记丁盛同志晚年

• 迟泽厚 •

1976年10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打倒，举国欢腾。然而，就在人们翘首期待着彻底清算“四人帮”的罪恶、拨乱反正之时，却传来了与“四人帮”既无历史渊源、言行又格格不入的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成为“四人帮”的同党被“揪”出来的消息！丁盛在1974年之前曾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多年，这一消息在广州军区机关引起很大震动。我作为长期在广州军区机关秘书部门工作，对丁盛有所了解的人，更是深感惊诧，百思不得其解。

#### ◇ “英明领袖华主席”亲自点名

丁盛被定为“四人帮”同党，是由因领导粉碎“四人帮”而被称为“英明领袖”的华国锋亲自点名的。1977年3月24日，华国锋在中央军委座谈会全体会议上突然宣布：“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硬往‘四人帮’那里钻，他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错误，叶帅再三告诫他，初犯从宽，再犯从严。‘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把他当成自己人，他到上海很隆重地接待他，他参与‘四人帮’在上海余党密谋搞叛乱。他的谈话有记录可查，‘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听了丁的谈话以后加紧发武器，发了7万多件，急忙派人到北京来向‘四人帮’密报。一个大军区司令参与‘四人帮’搞阴谋，搞夺权，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有些了解华国锋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历的人感到不解：“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段时间军队权力极大，华国锋是靠广州军区“力挺”才在湖南站住脚的。1970年，47军军长、湖南省革委会主任黎原因部队移防而调离湖南后，时任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卜占亚奉命去湖南“支左”，本可顺理成章接替黎原职务，但丁盛和军区政委刘兴元却力主由华国锋当一把手，卜占亚退居第二。丁盛是有恩于华国锋的。那时的华国锋每遇大事常先征求刘兴元、丁盛的意见，对刘、丁毕恭毕敬，有如下级对待上级。为什么如今时隔几年，华国锋竟会对丁盛说出这样的狠话来呢？

有的研究者对此的解释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今天的华国锋已经是全党的“英明领袖”，抚今追昔，想想当年他仰广州军区领导之鼻息的那段经历，他心里大概会不是滋味的。不能期望他报什么恩，倒要谨防他找碴儿报复。历史上这种事情太多了。秦末最早起来造反的陈胜，曾对一起给地主干活儿的同伴说过“苟富贵，无相忘”这样仗义的话，可等他当了大王之后，穷哥们儿来投奔他，他却怕暴露自己的卑微出身，把来人杀了。江青狠整三十年代上海滩的旧交，也是这样一种心态。华国锋除了整丁盛之外，还整了广州军区一大批干部，绝不是偶然的。再说，华国锋要整丁盛，也是有由头的。1972年，华国锋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决心把卜占亚打上林彪“贼船”，要丁配合，丁却认为卜占亚即使有错误，也只是作风和工作方法问题，便敷衍了事，让华很没面子。以后卜占亚屈打成招，丁盛却因毛泽东说了他的好话而逃过一劫。如今有了机会，岂可错过！

当然，要整丁盛的绝不止华国锋一人。起码，如果没有军内有力人士的点头、支持，华国锋不会有此胆气。

## ◇ 磨难

被华国锋点名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撤职，抄家，无尽无休的拉往各处批斗，两次长达两年多的不说任何理由、没有任何手续的关押，妻子儿女被赶出军区大院……。

1980年之后，“英明领袖华主席”不再英明，他说过的很多话、作的决定遭到批判。但是，奇怪的是，他对丁盛的定性，却被不走样地继承下来。

1980年开始的“两案”审判，丁盛名列其中，但不算主犯，所以没有出庭。11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提出的对丁盛的起诉书称：“1976年8月，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到上海，在延安饭店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作了半夜密谈。丁盛说：‘我最不放心的就是60军’，‘这个军我根本调不动’，‘这个军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这一线，我很担心’，‘你们要有所准备’。马天水……随后突击发枪74220支、炮300门、各种弹药1000多万发，为发动武装叛乱作了准备。”

据说，起诉书的材料来自“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人的供词。我看后的第一感觉是：荒唐、幼稚，丁盛怎么能讲出这样没水平的外行话来！稍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建制部队的调动大权集中于中央军委。对像丁盛这样的大军区领导而言，只要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哪个部队都能调动；未经中央军委批准，哪个部队也不能调动。因此，不存在哪个军调得动、哪个军调不动的问题。我尤其奇怪的是，起诉书为什么偏偏提到60军？要知道，60军在南京军区所属的几个军中，在历史上K不是很强的部队。倘若起诉书认定丁盛真的讲了60军他调不动这样的话，这可算是对这个军的褒扬，那么，反过来岂不是说南京军区的另几个军，其中包括鼎鼎大名的“硬骨头六连”所在的第1军，倒是可以放心，可以调动他们参加“四人帮”的叛乱吗？这岂不是在政治上对另几个军的莫大的侮辱吗？

这个起诉书的材料虽然经不起推敲，但其执笔者在其他方面还是颇有心计，颇下功夫，可算是一个老到的刀笔吏。如丁盛明明是到上海一带作战场勘察后住进延安饭店，马天水等人是偶然得到消息去作礼节性拜访的，但他却写成“……丁盛到上海，在延安饭店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作了半夜密谈”，笔尖轻轻一转，就变成丁盛是专门去上海与马天水等人密谋了。丁盛与马天水等人这次会面前后不过一个小时，当时丁盛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时任南京军区政委的廖汉生都可作证，起诉书则写成“作了半夜密谈”！好个“半夜密谈”，要多严重有多严重！

又过了1年零8个月。1982年7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才对丁盛下达了一个《免于起诉决定书》。决定书完全肯定了1980年起诉书中所列的丁盛罪状，“已构成策动武装叛乱罪”，而且“经审查核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只因为丁盛是“从犯”，于是“决定免于起诉”。

《免于起诉决定书》对丁盛“罪状”的表述与《起诉书》略有出入，引人注目的是这样两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丁盛）他们谈了在毛主席逝世后可能打‘内战’”，“丁盛还表示：‘我是准备杀头的’”。这两句话分量很重，对丁盛投靠“四人帮”的决心表述得淋漓尽致，但是，却又引起我的一连串疑问。这里最大的疑问是：丁盛与马天水等人素昧平生，政治上丁盛对他们毫不摸底，特别是徐景贤和王秀珍，还是为丁盛所鄙视的“造反派”，他们又没有预先串连，丁盛凭什么对他们竟会一见倾心，冒冒失失，不惜以自己的身家性命作筹码，毫无顾忌地同他们密谈“打内战”的问题呢？难道他不知道，从古到今，窃议最高领导人（古代是皇上）的身后事，都是要命的弥天大罪吗？

“免于起诉”自然是宽大处理，但就性质来讲，仍属刑事犯罪，行政和党纪处分那是免不了的。职务早在1977年就没有了，决定书下达之后，接着是命令“退出现役”（有人干脆称之为“开除军籍”），交地方安置，开除党籍。原有的物质待遇自然都没有了，每月只发生活费150元。

把丁盛交地方安置，也是有条件的：沪宁线不行，回广州不行，北京更不能去。争来吵去，直至1984年7月才把他交给了南昌市老干局的一个干休所，而且不得随带子女。

由于心情不好，生活、医疗条件又差，1984年9月18日，丁盛在去医院看病途中，突然心脏病发作，重重地摔倒在地上。他感到自己快不行了，多年来遭受的无数屈辱郁积心头，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这个打了半辈子仗、人称丁大胆的老兵，竟然如江河决口，失声痛哭！在场者无不凄然。他认为自己不能这样糊里糊涂地背着黑锅死去，他还是相信组织，相信共产党，他给中共中央发了一个电报，要求派人来听听他的最后陈述。总算不错，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纪委各来了一位处长。听了丁盛的陈述，两位处长也为之动容，却爱莫能助，只能答应回去后如实汇报。丁盛的病情日益严重，到了10月间，终于同意他回南京治疗。军队医院不能住，他被安排住进了铁路医院。

#### ◇ 漫漫申诉路

丁盛是个性情刚烈的人。“文化大革命”中，虽然他也在风口浪尖经受了不小磨练，吃了不少苦头，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有人会把参与政变阴谋的罪名加到他的头上。他困惑，他委屈，他愤怒，他豁出去了。他从不认“罪”，他奋起抗争。他同每一个要他交代问题的人吵，对着干。以后感到这样做没有什么用处，就横眉冷对，不理不睬。

他写过许多申诉，但都是泥牛入海。

笔者也介入了丁盛的申诉活动。

我与丁盛其实并没有很深的历史渊源。1949年8月，我所在的四野第48军解放赣西南地区后，军主力奉命就地驻防剿匪。这里是丁盛的家乡，当地一些群众向我提到他，我才知道有个丁盛。此时他是45军135师师长。1960年，丁盛率由44军和45军整编而成的54军主力在西藏平叛，恰巧我也参加了这场斗争，才第一次见到他，K有过短暂的交谈。1968年春他从新疆调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一年多后任司令员，我先任军区司令部办公室秘书科长，后任办公室副主任，才与丁盛有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S。

我从1951年开始做秘书工作，1953年调中南军区司令部。几十年间，除当过几年作战参谋外，一直在秘书部门围着领导转。几十年的秘书工作经历使我得出一个结论：领导干部的活动，从工作到私生活，很难逃出一个尽职尽责的秘书或秘书部门的眼睛。以我对丁盛的了解，从一开始我就对加在他头上的罪名深感怀疑。及至看了他的“罪证材料”，更感到难以令人信服。

1988年8月，我回山东探亲，在烟台意外地与丁盛夫妇相遇。他们住在一个老战友的孩子家。我与丁盛进行了一次长谈。我问他：定案材料中讲，他曾于1976年8月8日对“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讲，60军“我根本调不动”，“这个军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这一线，我很担心”，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激动地说：“根本就没这回事！60军是我到南京之后，为了战时加强长江口的防御，经我提议，报中央军委批准，才从江北调到沪宁线的。如果我指挥不动，为什么要自找麻烦？”

如果不是心存偏见，应该承认丁盛讲得确有道理。

定案材料又讲，“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听了丁盛关于他指挥不动60军的谈话之后，便给他们控制下的民兵突击下发了大量武器弹药，准备发动武装叛乱。材料的炮制者竟然没注意到，1976年12月10日发出的中共中央文件《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中，早已认定“今年（1976）6月，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病重后，王洪文多次催促上海市某些领导人给上海民兵发武器弹药”。可见此事早在所谓丁盛关于60军的谈话之前两个月，“四人帮”就已作了决定，现在却又扣到丁盛头上，露了大马脚。这种造假水平实在太低，用一句山东话讲，是顾头不顾腚啊！

听了丁盛本人的陈述和研究了若干材料之后，我感到对他的定罪材料存在着很大的任意性，破绽百出；而且对丁盛这样处理，并不是对他一个人的问题。我有责任帮他把此事弄出个究竟。

1989年冬，丁盛来广东，先到深圳他女儿克西家住了一段时间，春节后应广州军区原副司令员杨梅生的遗孀刘坚和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李维英之邀，又到广州住了一段时间。1990年2月27日，在李维英处，丁盛夫妇、李维英夫妇、丁盛的老秘书陈宏康和我，一起研究了丁盛的申诉问题。大家得出一个共识：解不解决问题在你，但不可中断、放申诉，即使申诉无用，“立此存照”也好。随后，由我执笔写了一份《我的申诉》，针对《免于起诉决定书》所列罪状，逐条进行了辩驳。

这年5月，丁盛夫妇去了北京。丁盛先是找中共中央组织部，以后又找中纪委、军委总政治部。几个部门似乎都有权力、有责任管，又都有理由不管，跑了几个月，没有一点结果。最后他不得不去找他的老上级、十大元帅中唯一在世的聂荣臻元帅。这年聂荣臻已是91岁的老人。聂荣臻元帅办公室负责人周均伦很同情丁盛的遭遇，亲到丁的住处看望，建议丁盛给这位老帅写个报告。随后，周均伦拿着丁盛的报告向聂荣臻汇报了丁盛的问题。聂荣臻对丁盛在战争年代的表现和解放后的工作成绩都给予很高评价，但对丁盛在“文化大革命”后的情况，则因他在1967年后被打成“二月逆流分子”基本没有工作而知之甚少。他采取了客观、负责的态度，交代周均伦以他的名义把丁盛的报告批给中央军委的一位副主席和军委秘书长，请他们认真受理丁盛的申诉，弄清情况，按照党的政策作出适当处理。丁盛得到消息，不胜欢喜，但他苦苦等了一个多月，却再无下文。以后他了解到，军委这两位领导人根本没把聂荣臻的批示当一回事，其中一位还口出不逊，说是“多管闲事”！倘若聂荣臻当时还在台上，事情肯定不会是这样了。

这件事让丁盛受到很大刺激。元帅批了都不管用，在北京住下去已经毫无意义，而且北京的天气也冷起来了。他应在天津的一些老部下的邀请，又到天津住了几天，到民权门和金汤桥一带默默凭吊了当年攻打天津时牺牲的烈士，便又两手空空，悄然返回深圳的女儿家。

#### ◇ 不愿解铃的系铃人

沉寂了几年，丁盛决定继续申诉。笔者同他一起分析了形势：要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其复杂处就在于他被扯入了一个集团案，整个集团定性未变，他的问题很难单独解决。因此，要有长期思想准备。但是，如何申诉，还是大有文章可做。我注意到，丁盛的定案材料只有一条罪状，即由于他讲了60军不听指挥的话，结果导致“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加快准备叛乱。而此事据说是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人受审查时交代的。我想了一个“釜底抽薪”的方案：如果能让三人中的一人讲出他们当时是如何编造出这个口供的，岂不就可以从根本上推翻对丁盛的指控了吗？由于马天水已经死亡，而王秀珍是个工人，我建议从徐景贤身上突破。丁盛赞

同我的意见。

1998年4月14日，我先给上海一位作家写去一信。这位作家以写“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重大事件内幕和风云人物秘闻而蜚声文坛，他与徐景贤是老关S，我与他有一面之交。由于不知道徐景贤的通信地址，给徐的信需请他转交，同时也希望他和徐先通一通气，做做徐的思想工作。信发出后不到一周，我又托去上海出差的一位熟人去拜访这位作家，着重就如何给徐景贤写信问题向他求教。这位作家表示愿意帮忙，K就该如何给徐写信提了很好的建议。

5月，丁盛按照作家的提示给徐写去一信，请作家转交。徐景贤等人的“证词”让丁盛毁掉了一生荣誉，饱受磨难，但丁盛在信中却表现了极大的宽容大度。他先是对徐热情问候，然后讲了他的现况，最后才恳切地提出希望徐景贤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说明关于丁盛的那段口供或曰“证词”的来历。信中写道：“如前所述，给我定罪的由头是1976年8月8日我同你们三位的会面与交谈，而惟一的证据则是所谓你们三人的‘证词’。同样，这‘证词’又成为拒不受理我申诉的挡箭牌。我深知你们当时的处境，倘若真有什么‘证词’，也不难想见它是怎样产生的，其责任K不在你们。实际上对我的处理早已内定，有没有你们的‘证词’，其结果都是一样的。”丁盛在同时写给那位作家的信中，除对他的热心表示感谢，K提出如认为他给徐的信有何不妥，可以指出，退回重写。

然而，信发出后，徐景贤却未回应。

2000年春，我去大连看望我的入党介绍人、曾目睹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程转九同志。归途我特意在上海停留。5月20日上午，我去拜访那位作家，专谈丁盛问题。他说，收到丁盛写给徐景贤的信后，便经由徐的小女儿将信转交给他。他说：“丁司令（他确实是这样称呼的）的信写得很明白，徐景贤看后也会认真考虑的。”但是，“根据我对他的了解，他现在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是不会为丁司令员作证的。他知道，如果现在由他出面来推翻他原来的供词，那会给他带来很大的麻烦。如果是由组织出面，比如中央组织部收到丁司令员的申诉后向他作调查，那可能就会是另外一种情况，他会一五一十地把问题讲清楚。”“这个人很聪明，可惜太聪明了！”“听说他现在正在写回忆录，不知道他会不会提到这件事。”“他虽然已经恢复了公民权，但是仍由市XX局X处管着。”最后，这位作家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丁司令员的问题，只有一个人可以解决——胡耀邦。可惜他死了！”

我认为这位作家对我这个新交的谈话是坦诚的。我提出，想争取和徐景贤直接谈谈。他把徐景贤女儿的电话告诉了我。我随即给徐女士打电话，说1969年开“九大”时我曾同她父亲打过交道，也可算是旧交，我定于22日离开上海，希望走前能看看她的父亲。第二天，徐女士来电话告诉我：他父亲和几个朋友到郊区去了，可能当天不能回来！

事情果如那位作家所料。既然他有顾虑，不肯见我，岂能勉强？罢了！

2004年，徐景贤在香港出版了他的回忆录《十年一梦》。他自称此书是“忠实于事实，对历史负责”，却对他在江青、张春桥等人指使下干的坏事极尽洗刷、粉饰之能事，K多有讹误。如书中讲：“九大”期间，上海代表团仅于三月二十七日、二十九日在住地京西宾馆对陈毅元帅批斗了两次，即听从周恩来的劝告“适可而止”。这是公然撒谎，实则对陈毅的批斗几乎贯穿“九大”的始终。他把时间、地点也弄错了：“九大”是四月一日才开幕的；上海代表团也不住京西宾馆，而是与我所在的广东代表团同住北京饭店。对丁盛问题，他在“特别法庭”上所作的“证词”中承认曾与丁盛有过“密谈”。而奇怪的是，在正文中却根本未提此事。这么一件关乎他和丁盛命运的大事，岂能疏忽遗漏？正如那位作家所说，这人“可惜太聪明了”！

## ◇ 总算有了一个“窝”

丁盛时断时续的申诉，也不能说没有一点结果。在物质待遇方面还是多少有些收获。

1993年8月2日，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联合向南京军区发出通知，将丁盛的生活补助费每月增加50元；可以享受与当地退休干部相同的生活补贴和与当地城镇居民相同的价格补贴；医疗由军队按正师职干部安排。

1995年，经中纪委和军委纪委协商，决定将丁盛收回军队，由广州军区接收安置。广州军区为丁盛在军区司令部干休所安排了一套师职离休干部住房。从此，丁盛夫妇结束了长达十几年的漂泊生涯，总算有了一个“窝”。

丁盛在生活上一向比较随便，随遇而安。自从遭整之后，在政治上他不服，他愤怒，他抗争，但是在生活上，他却努力使自己适应新的环境。过去他是不管家的，也不需要他管。现在，凡是力所能及的事情，他什么都干。1984年10月之后，丁盛因病从南昌回南京治疗，以后几年大部分时间便与妻子儿女们住在一条小巷内的一栋旧民宅里。当地居民经常看到一个70多岁的老人，提着篮子出入菜市，买些便宜菜。不久，大家便知道这是原来的南京军区司令员，是个老红军、老将军。有的邻居和他攀谈，感到这个老头儿很和善，很随和，怎么看也不像个坏人。有人叫他“丁司令”，他赶紧摆摆手说：“咳！别这么叫，我现在不是了，叫老丁。”

丁盛治军很严，但平时关心爱护干部，尤其关心下级疾苦，这方面口碑很好。他遭整后，54军和原45军曾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干部，几乎没人相信老军长会干起诉书所指控的那种事情。过去一些与他没有联系的老部下，在他遭难之后，反而通过多种渠道与他联系，有些人还邀请丁盛到他们所在城市走走看看。54军和原45军在解放战争时期从东北打到两广，不久后参加朝鲜战争，回国后改隶成都军区，参加了西藏平叛和中印边境作战，以后又先后转隶武汉、济南军区，因而全国很多地方都有54军的转业干部和离退休干部。丁盛应老战友和老部下之邀，与妻子一起到过不少地方。每到一地，探访者应接不暇。在北京和天津、昆明、重庆等地，因为要来看望的人和丁盛要回访的人太多，便有热心人组织聚餐会，北京的聚餐会竟然到了近200人。有的人与丁盛分别几十年，见到当年英姿焕发干练豪放的老首长，如今历经磨难，竟像是换了另一个人，无不为之黯然。丁盛夫妇要走了，大家争着为他筹措路费。有些早年转业的基层干部，生活相当困难，也一定要凑几块钱，表达一点心意。丁盛曾多次对熟人讲，他晚年有三靠：一靠妻子儿女，二靠组织，三靠老战友。前两靠不言而喻，第三靠丁盛感受最深。这些当年同生死共患难的伙伴，在他遭难之后，不仅在生活上关心他，而且在政治上继续信任他，大家不相信他会参与“四人帮”的阴谋活动。老战友、老部下对自己的关心和信赖，使丁盛得到极大宽慰，更激励了他为讨还政治清白而斗争的勇气和信心。一讲起同这些老同志的深厚情谊，丁盛就满怀深情，激动不已。

丁盛的第一靠是靠妻子儿女。在精神和生活方面，他确实一直得到妻子儿女的极大关爱，但在经济方面，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他是指靠不上的。丁盛被点名批斗之后，还没等到正式处理，他的妻子儿女便都受池鱼之殃，几个孩子或转业，或下放，全家在经济上顿时陷入困境。上世纪80年代丁盛那150元的生活费，他要用于安排全家生活。他要尽量省钱。1993年8月，他和妻子乘火车从济南回南京，嫌软卧太贵，买了两张硬卧。是老式的三层硬卧车厢，售票处按惯例卖给他们一上一下。丁盛让妻子坐在下铺，他费尽气力，战战兢兢地爬上爬下。到南京后，又是连日酷暑难耐，这年他整80岁，那能经得起如此折腾？结果大病一场，差点儿送了性命。这种日子，对一个过去的大军区领导人来说，心中会是什么滋味？

1995年4月，我受命为一位开国上将作传，去深圳采访住在女儿家中的丁盛。此时丁

盛的几个孩子通过自身努力，都有了比较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全家经济状况明显改善。采访完了我要离去时，丁盛起身从窗台上拿来一个装有许多硬币的罐头盒子，对我说：“你坐公交车，车上不找零，你拿点零钱去。”他夫人在一旁说：“深圳上车7毛钱，实在扭，还不如干脆像广州那样，收1块钱算了。”丁盛听了一本正经地说：“我就不同意你的意见，我就不嫌麻烦，还是愿意省这3毛钱。”他的话让我感慨万千。有句俗话：“一文钱难倒英雄汉”。没有过苦日子的人，是不会有丁盛这种感受，说出这样话来的。

丁盛在军区司令部干休所安家之后，物质生活有明显改善，心情也舒畅了许多。这里毕竟可算是他的“老家”——广州军区的前身是第四野战军，再往前追溯，抗日战争时期是八路军115师，红军时期是中央红军。丁盛一参加革命就在中央红军。说是宗派、山头情绪也罢，怀旧也罢，军人对老部队都怀有特殊感情。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到一个没有一点历史渊源的新环境和在老部队的感觉是大不一样的。特别是这个干休所的离休干部，大部分是丁盛任军区司令员时的司令部机关干部，丁盛对其中许多人都很熟悉，彼此可谈的话自然很多，也不必互相戒备。丁盛喜欢下象棋，情报部的一位副部长是和他经常交手的棋友，两人有时一下就是半天，杀得难分难解，旁边还经常围着一圈为两边支招的人。干休所领导自然也了解丁盛的情况，对他尽可能给予一些照顾。

1999年初，干休所建成一栋30层新楼。新楼各方面的条件都比丁盛住的房子要好。干休所又把他安排到新楼。丁盛对新房十分满意，他最喜欢的是主房的南面有个大阳台，夏天可以乘凉，冬天能晒太阳。他在阳台上摆了一个茶几和一对沙发，经常和夫人在此小憩。他曾对我说，他住过很多房子，但他最喜欢的是两套，一套是他当军长时在重庆住的，再就是这一套。这套房子设计合理、适用。

#### ◇ 最后的关怀 最后的遗憾

1998年8月，为讨还政治清白而坚持斗争、苦苦等候的丁盛，忽然得到北京一位老友传来的喜讯：丁盛的老首长、“两案”审判时担任特别检察厅厅长的黄火青，决定亲自出面请求为丁盛平反，要丁盛立即赴京，面商有关事宜。丁盛兴奋不已，立即和妻子赶往北京。

抗日战争末期，丁盛曾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当时黄火青是党校秘书长；解放战争时期，黄火青曾兼任热河军区政委，丁盛是热河军区下属一个军分区司令员；稍后，黄又任冀察热辽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丁盛是这个军区的一个旅长。新中国成立后，黄火青专做地方工作，曾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东北局书记处书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决定对“两案”进行审判时，他被指定为“特别检察厅”厅长。在认真看了对丁盛的起诉材料后，他认为证据不足，建议不要把丁盛列入起诉名单。但是，他的意见被否定。

见到关心自己的老首长，丁盛格外激动。黄火青是一个律己甚严而又和蔼可亲的老革命家，他过着恬淡简朴的生活，屋子里摆的还是几十年前公家配的旧家具。这年他已是98岁的老人。

黄火青简单地问了丁盛的一些近况，便很快转入正题。他说，虽然他已很久不工作了，但是还一直记挂着丁盛的问题。他对丁盛的遭遇深感同情和惋惜。他表示，将尽最大努力，争取使丁盛的问题得到合理解决。他给丁盛出了个主意：当时正值印度进行了核弹试验，又在中印边境炫耀实力，丁盛曾在1962年参与指挥中印边境战争，对中印边境地区和印军情况比较了解，不妨给中央军委领导写个报告，先对加强中印边境战备建设提出建议，然后再顺便提出自己的申诉。报告由他转呈，他也写个报告，提出对丁盛问题的处理意见，一并上报。估计这样比较容易引起领导人的重视，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丁盛随即按照黄火青的指点写出报告。考虑到报告的文字不宜太长，丁盛对加强边境战备建设问题写得比较简略，而另写了一份《对当前中印边境斗争的几点建议》，作为报告的附件。丁盛在报告的申诉部分，扼要地谈了他当前的困境，“今年85岁了，右眼失明，又患有严重的心脏病、甲亢病，生活不能完全自理，老伴又是一个老病号，动过5次手术。多年来，全靠子女和战友们接济生活。”他恳切表示，自己“热爱党，热爱军队”，“希望能回到党和军队中来，在有生之年能解决党籍军籍问题，并提高一点生活待遇”。

报告呈上去了，因为是黄火青具名，军委主要领导作了批示：请军委纪委调查了解情况后处理。但是，什么时候才能调查清楚？有多少程序、过场要走？需要多少时间？谁也说不清。在北京是等不起的。丁盛夫妇只好又回广州等候消息。

等到1999年1月，丁盛在北京的那位热心的老友终于来信了。跟5个月前的情况相反，这是一封让丁盛泄气的信。这位老友的信一开头便写道：“两次请你们来京，事情都没办成，我实在感到歉疚，对不起故人。”事情没有办成，是黄火青让他身边的人通知丁盛这位老友的。据黄火青的身边人说，“黄老自己也感到难受，他（黄火青）说，‘今年办了两个人的事，都没有办成，感到对不起丁盛同志’”。黄火青原想先争取使丁盛恢复党籍军籍，但是最后得到的答覆却是：“案不能翻，生活可以适当改善。”话说到这种地步，黄火青也无可奈何，只能慨叹“谁知结果是这样”！黄火青还得到通知：军委领导人的批示已形成文件，发往广州军区，届时有关部门会找丁盛落实批示精神。这位老友最后劝慰丁盛夫妇想开一点，“保持身心舒畅，至于历史的功过，任由后人评说，谁又能封住后人之口？！”

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心情怎能舒畅？不过，有人劝慰丁盛：政治问题一时解决不了，能先改善一下物质生活也好，物质待遇提高了，也有助于消除或减少一些人对丁盛的政治偏见。丁盛认为这意见不无道理。

但是，又等了半年，却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7月11日，我又帮丁盛分别给黄火青的身边人和丁盛在热河时的另一位战友写信（先前那位老友到美国看望留学的女儿去了），反映了这一情况。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丁盛还没等来北京的正式答覆，便突然病倒了。8月26日，他因高烧住进了军区总医院。医院诊断他患了肺炎。虽然按上面规定他只能住师职干部病房，但是医院方面对这位老司令员还是尽可能给予适当照顾；同时，丁盛的长女丁力是他所在科室的负责人之一，更使他得到许多慰藉。丁盛住院后体温一直不退，但他精神很好，头脑清晰。9月初我去探望他时，他表示对治疗很有信心。其实，他对病情的凶险还是有所了解的。他曾对丁力讲，他知道，朱老总就是得他这种病去世的。也许正因为有了这种不详的预感，他和自己的亲人谈了许多平时他很少讲的往事与人生感悟。他说，如果他不参加革命，不过是一个放牛娃，所以，他对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无怨无悔。晚年他虽遭不幸，但是令他感到宽慰的是，过去的战友们都关心他，信任他；来到军区司令部干休所，工休人员都尊敬他，照顾他；自己的子女都很争气，他没有后顾之忧。当然，他也看到有些过去的熟人，现在见了他不大自在，有的人甚至和他“保持距离”，这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事实真相，他理解人家的心情，要体谅人家；但是，对有人劝他“看淡一点”，他却说：“这话看怎么理解，如果是劝我不要消沉悲观，我赞成，如果是劝我认错认罪，那就是是非不分了，我没有的事，又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我绝不能承认，不存在看重看淡的问题！”他对有关方面迟迟不处理他的问题，感到很理解。他知道自己已是耄耋之年，来日无多，时间的优势不在他手里，他陪不起，拖不起，常常为此焦急。但他坚信，只要是共产党，迟早总会给他平反。

9月22日，在几十年的战争环境中体力严重超支，最后20年又备受屈辱，早已心力交

瘁的丁盛，病情急剧恶化。医院把包括钟南山院士在内的广州几位著名专家请来会诊，最终仍无法挽救他的生命。9月25日，丁盛与世长辞。在丁盛弥留之际，他的妻子孟文虹和子女们曾给军委主要领导写信，报告丁盛的病情，并请求为丁盛平反，让这个一直心在共产党、心在军队的老战士安然地离开这个世界。自然，这封信也没有结果。

#### ◇ 困惑与反思

丁盛去了，他怀着莫大的遗憾去了。斯人虽逝，却留下了一串令人困惑、发人深省的问题。

大家议论最多的是，丁盛究竟为什么遭难？很多人认为，丁盛是在劫难逃。他长期在林彪、黄永胜领导下工作，在衡宝战役中率孤军插入白崇禧集团的心脏，为歼灭白崇禧集团主力立下大功，受到林彪嘉奖，以后又继黄永胜之后任广州军区司令员，这些原本辉煌的历史，当毛泽东把林彪视为“反党集团”的头子之后，对丁盛就很不美妙了。1971年8月底，毛泽东在长沙接见广州军区负责人时，曾问丁盛、刘兴元：“你们同黄永胜关系这么密切，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得了？”这话绝不是随便说的。丁盛不该忘记，当时华国锋就在现场，他是以善于揣摩、领会毛泽东的意图而著称的。“九一三”事件之后，大批原四野干部受到审查、处理，但因毛泽东曾讲过丁盛、刘兴元的好话，才使他们躲过一劫。然而事实证明，像他们这种经历的人，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在长沙被接见的广州军区丁盛、刘兴元、卜占亚三人都被陆续“补课”，无一幸免。所不同的是，刘、卜被划入“林彪反党集团”，而丁盛却莫名其妙地成了“四人帮”分子。为什么要把丁盛和“四人帮”弄到一起？有人认为，这是形势使然，斗争需要，符合“大方向”。这样有助于深揭和坐实“四人帮”图谋掌控军队的野心。更何况丁盛在大军区司令员中资历浅，他在南京又是个“外来户”，只要上面给他定性、点名，不愁众人不一拥而上——当年批斗彭德怀、罗瑞卿、刘少奇无不如此，概莫能外。也有人说，丁盛这人说说话、做事太冲，不会拐弯，不懂韬晦，有些人（当然不是一般人）早已对他不满，他却浑然不觉。他挨整是早晚的事儿，但绝没想到他会成为“四人帮”分子，这可真是……

最早把丁盛“端”出来时，华国锋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他（丁盛）的话有记录可查”；以后，军事检察院的“决定书”也说，丁盛的“罪状”“经审查核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是，不管丁盛本人或他的亲属如何强烈要求，有关方面却始终不肯拿出为丁盛定罪的任何证据。这不仅使丁盛和他的亲属不服，许多关心此事的局外人也深感诧异：既然丁盛不肯认罪，又申诉不断，何不把证据亮出来，只不过是举手之劳，既能让丁盛老实认罪，又可教育广大群众！

丁盛不断申诉，有关方面多数情况下不予置理，当不得不答覆时，则说：上面有“精神”，为了保持安定团结，凡是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已作过处理的，一律不再处理。这就奇了，且不说“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这种提法本身就很不正确，是一种极左政治术语，关键是这两次“路线斗争”情况极为复杂，谁敢保证件件处理正确？倘若错了，为什么却“一律不再处理”？不是讲“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吗？不是讲“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纠正”吗？不是说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吗？为什么新的“凡是”就是金科玉律，冒犯不得呢？至于说什么“安定团结”，岂不知物极必反，不平则鸣，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明知有问题而置之不理，只会增加动乱因素，何来安定团结！

丁盛的遭遇令许多老干部为之不平，更有人为之奔走呼吁，虽然收效甚微，却让丁盛深受感动，得到莫大宽慰。这些人几乎都是已离休的无权者，因而他们的意见和呼声尽管可能反映民意，却未必能引起重视。而一些当权者，则对此事采取了极为谨慎甚至冷漠的态度。特别是有几位丁盛当年的部属，在丁盛申诉的后期都位居要津，他们对丁盛的基本情况应该是了解的，

也应该看到丁盛的申诉材料。他们确实无权为丁盛彻底平反，但也绝不是完全无能为力。然而，可能是为了避嫌，他们都采取了回避态度。不知这是否也是中国特色？

#### ◇ 尾声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中提倡“人死了，开个追悼会”。丁盛是个有公民权的人，一生又出生入死、竭智尽忠，为共产党打江山，自然应该为他开个追悼会。经过请示，有关方面答覆：主要由亲属办理。既开追悼会，就得发讣告，布置灵堂。讣告和灵堂的横幅该如何称呼丁盛？亲属按惯例拟写“丁盛同志”，不料，过去对丁盛的申诉或者没有反应，或者反应慢得出奇的有关方面，这次却反应奇快：不能称同志！为什么？没作解释。那么，丁盛是1955年授衔的少将，“决定书”并没宣布剥夺他的军衔，可否称为将军？也不行！丁盛是1930年的红军，他出事之后南京军区只是宣布“命令”他“退出现役”，并没说开除军籍，称老红军总可以吧？答覆还是不行！

丁盛的妻子儿女们一起商议该怎么办，大家都犯难了，总不能就叫丁盛吧？

我被邀请参加了他们的家庭会议。我搜索枯肠，提了个意见：中国有尊老传统，老作家巴金、冰心，他们晚年大家都尊称为巴金老人、冰心老人，一位著名女歌手唱的一首歌中，也称邓小平为老人，我看就叫“丁盛老人”吧！大家议了一阵子，虽然觉得不太理想，最后还是都同意了。

不少人认为有关方面的决定太不近人情。有些不知内情的人，以为“老人”的称呼也是官方定的，以鄙夷、揶揄的口气说：“哼！真想得出，来个‘丁盛老人’！”我听到后赶紧声明，这是我的建议。对方马上换了口气：“你还真能发明创造呀！”我只能苦笑。

1999年10月7日，“丁盛老人”的告别仪式在黄花岗殡仪馆大厅举行。几百人挤满了大厅。参加者都是自发来的，不少人来自外地。没有在职的领导干部到场。灵堂四周摆满了花圈，花圈飘带上写的对丁盛的称呼因吊唁者的身份而异：同志、将军、老首长、司令员……，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丁盛老人”。

“凡犯了错误的必须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以前更高。”这是毛泽东于1967年5月对广州军区和湖南省军区两个反映“支左”情况报告的批示。毛泽东当时主要是批评这两个单位对“造反派”支持不力，要求军队改变观念，跟上形势，真心支“左”。毛泽东的批示是不对的，“造反派”是什么货色？他们已经以自己的行动为自己作了结论，毛泽东在作批示后仅一年多时间，便也公开表示不再支持“造反派”了。但是，此话的一般道理还是对的。用于对丁盛问题的处理也很贴切，有针对性。所以，我用此话作为本文的结尾。

2008年3月5日上午于广州

~~~~~

【不平则鸣】

丁盛将军申诉书（余汝信先生提供）

• 丁 盛 •

给组织的一封信

×××同志：

你（们）好！我本着尊重客观事实、相信党的实事求是政策的态度，再一次将我的问题以及目前处境向组织详谈。望组织明察，重新审理，早日澄清我的不白之冤！

仅凭我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在一个晚上的谈话（马、徐、王就此捏造出的假口供详情见附页），就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只据这假口供判定我密谋、策动武装叛乱罪，这与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和我国法律“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相违背的。

早在七七年三月，华国锋在未经任何调查与核实的情况下，就在全军工作会议上平白给我定了密谋、策动武装叛乱的基调。以后便照此办理。三月二十六日宣布停职审查，未经任何法律手续，将我先后关押两次，长达两年之久。六年内除专案组具体办事人员外，没有任何人找我谈话，没有任何人找我核实材料。八二年六月，我向总政检察院、法院三名干部反复详谈了8月8日和9月3日的谈话内容，并一再声明绝对没说马、徐、王捏造的口供，也不可能说类似的话，他们还是强行宣布我触犯刑法93条，密谋、策动武装叛乱罪，免于起诉。

八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军区政治部王副主任给我念总政电话通知：“退出现役，每月生活费150元，享受一般干部待遇”。十一月由专案组一名干事口头通知：“开除党籍”。至今我没见到处理我的正式文件，我几十年的党籍、军龄便告此结束。冤枉！我想不通。

八四年六月，军区勒令我月底离开南京前往江西居住。我年逾七十，身残体弱，患有严重的心脏病，生活不能自理。孑然一身，日子实在艰难。苦苦支撑三个月，心力交瘁，九月十九日突然昏厥休克，脑部摔伤。周围群众竭力奔走呼救，经抢救我有幸复生，但有关人员在我入院救治问题上百般限制，所住医院无脑外科，脑伤得不到医治。实在无奈，被家人接到南京治疗。今年来我又两次住进医院，病中虽能得到亲人护理，但因我的供应关系在江西，在住院、看病用车、医疗费用以及食品供应等问题上均无着落。我三〇年参加红军，遭坏人诬陷落此下场，令人心碎。我希望组织接受我两个恳求：

一、重新审理我的问题，弄清真相，请允许我去京。向组织呈述我的意见。

二、我已失去独立生活的能力，请求组织将我的关系转回南京，与家人团聚，度此余生。

致

敬礼

见附件一份

丁盛（签名）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附件）

与马、徐、王谈话的真情及我的自白

（一）去上海的目的以及76年8月8日与马、徐、王怎么见面的。

七五年我心脏病复发，遵叶帅的指示，从九月至七六年二月，一直在南京中山陵养病。讹传我不听叶帅招呼，去了上海治病，这不是事实。

七六年八月，军区八九月份要在上海、杭州湾搞陆、海、空演习——这是由总部批准，有各大军区及总部的人参加，军区领导也全部参加的活动。这样，我因工作去了上海。

七月三十日，我离宁经上海视察演习部队及附近海岛部队。八月八日坐了一天海船到长江口大小洋山，李宝奇（上海警备区政委）到那儿接我。抵达上海，李宝奇问我：“你来了上海，要不要告诉上海市委？”我说：“不要。”九点多，我在延安饭店准备休息，秘书陈长顺告我：廖汉生政委的张秘书来说：“廖政委明天请上海市的医生会诊，要我给上海市委打个电话，以引起他们的重视。”陈秘书因我劳累要休息，想请党办李主任打这个电话，张秘书说还请司令打好，我就按这一要求给上海市委办公室打了电话。不久，陈秘书告我：“市委来电话说马、徐、王要来看你。”十点左右，他们来了，闲谈了一个小时，我们一起去看了廖政委。

就这样，客观因素促成我意外地见到马、徐、王，决非我有意安排要见他们，而达到所谓密谋的目的。

（二）八月八日晚与马、徐、王谈话的内容。

一见面，彼此寒暄：“你们这么晚了，还来看我。”“应当。”“从哪儿来？”“从海岛来。”

我说了视察海岛的感受：“从长江口以东以南的地形看来，屏障多，兵力密度大，敌人（指外来侵略者）若想走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老路，肯定要失败的。而长江口以北，以东的地形我从没去过，但听说水网地区，没山作屏障，兵力密度小，这个地方我不大放心，以后要去看。”

我说：“这次我们部队要搞演习，要来很多干部，在车辆、交通秩序、副食品供应上都希望市委协助解决，要麻烦你们了。”

马说：“应当，不成问题。”

我说：“进长江口，水浅，大货船进不来，李先念同志讲过：每年罚款多少亿，你们挖个深水港多好呀！”

我问：“你们很忙吧？”

马说：“很忙，搞生产，忙给唐山运物资，这次唐山地震很厉害。”

马、徐、王主动提起：“军区七月份党委扩大会议开得好，抓住了问题的要害（这是检查部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工作的会议，是错误的）。你们军区领导人的意见都是一致的吧？”

我说：“是一致的。”

马问：“魏金山（六十军政委）怎么没参加这次会议？”

我说：“他有病，住院了。”

马说：“上警的一个副司令董常云思想不通，他现在出差了，等他回来后，我们要批评他的。”

马又问：“李宝奇同志是怎么来上海警备区当政委的？”

我说：“是军委派来的，也是我们军区党委提议来上警当政委的。”

马问：“李宝奇这个人怎么样？”

我说：“过去不认识，不了解，你看怎么样？”

马说：“李说话圆滑些，他在军委办事组工作过，他和刘耀宗不一样（上警另一政委），刘是直筒子，有什么说什么，对就对，错就错。”

马又问：“刘耀宗哪儿去了？”

我说：“他有病，在黄山休养。”

马说：“欢迎刘耀宗回上海工作。”我没答话。

我说：“我身体不好，有心脏病，经常发作。”

马天水指著徐景贤说：“可以安排他去华东医院检查一下。”

“好，谢谢。”

坐了近一个小时，我们一块去看了廖政委。

他们有意打听上警干部及军区会议的情况是别有用心。当时我只把他们当上海市委领导看待，没能识破他们反革命面目，失去警惕和防范，这是我的错误。

（三）九月三日与马、徐、王谈话的内容：

九月三日，十点左右，马、徐、王没打招呼，突然来延安饭店我的住处，我问：“你们来干什么？”马说：“最近有两批较多的外宾要来，看延安饭店的宴会厅是否容纳得下。”我说：“可以去看看。”

他们坐下来，我说：感谢上海市委给予军区这次演习的支援和帮助，马天水说不用感谢这是应该的。

马说：“市委给你们转去一封信，是无锡部队的。信中说：在部队招待所查出了四个箱子，不知放了什么东西。你们收到这封信没有？”

我说：“收到了”。

这时我告诉他：“我们也收到了一封信，是许世友儿子许建军写给某医院护士的。”他在信上说：“毛主席百年后要打内战。”我说：“打内战可不得了，我们已将这封信送中央了——送给陈锡联同志。”

马天水说：“我们也收到了类似内容的一封信，也送中央了。”

这事就说了这么几句。

（四）军事检察院的免于起诉书（下简称“决定书”）说：“八月八日晚，江青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到上海延安饭店看丁盛时，进行了密谈。他们说在毛主席逝世后可能打内战，分析了上海附近驻军领导的政治态度和兵力布置。丁盛对马、徐、王说：‘我最不放心的是六十军。’”这个军我指挥不动，这个军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这一线，我很担心。“”有什么事，对上海是个大威胁。“丁盛还表示：‘我是准备杀头的。’”随后马天水即给上海民兵突发了各种枪支弹药。这就构成我参与密谋武装叛乱罪。

（五）下面请组织听取一个老战士对党的自白：

（1）关于六十军的问题：“决定书”上说：“我最不放心六十军”“六十军对上海是个大威胁”……“你们要有所准备”。

事实上八月八日晚谈话，除问到魏金山（六十军政委）哪儿去了之外，根本就没有提到六十军。

至于我说的长江口以东以北的地形，完全是从上海的海外防御角度说的。与在上海以西京沪线上的六十军没有任何关系。马、徐、王的供词说我对六十军“很担心”，这完全是移花接木的栽赃，彻头彻尾的捏造。

说我说：“这个军我指挥不动……在宁沪线上，对上海是个大威胁……你们要有所准备。”我身为大军区司令，对下属部队根本不存在调动调不动的问题，事实上，我刚顺利完成了对六十军的调动。

我感到六十军的一个师配置在交通条件较差的淮阴一带，便提出将该师调到无锡市，经军区党委讨论，总参批准，七六年上半年该师调防，六十军军部也从江浦调到镇江。若说：“对上海是个大威胁”，这个“威胁”“不正是我自己造成的吗？真是无稽之谈。

（2）“决定书”上说我表示：“准备杀头”，这更是荒谬绝伦。我作为一个高级干部，有职有权，工作顺心，上下团结，情绪很好，心情愉快，神志清醒，我怎会出此悲观的混帐话呢？八月八号的谈话，除相互吹捧，并没有议论中央领导，也没有谈论全国的形势，我想的是演习，谈的是演习。我没有，也不可能说：“准备杀头”之类的话。

我在谈到什么问题时说“准备杀头”？它的前言后语是什么？它总不会是孤零零的一句话吧？

（3）“打内战”是许世友儿子许建军写信的内容，怎么成了我和马、徐、王谈了毛主席逝世后可能打内战；本是九月三日晚上的谈话，硬不顾客观事实，给安在八月八日晚上；是为了证实八月十一日马、徐、王的突击发枪，是谈及“打内战”而引起的，好加予我策动叛乱的罪名，这样又制成一个错案。

（4）我和马、徐、王的关系：我和马、徐、王过去不认识，七四年调南京军区工作后，在上海接触过三次，第一次是七四年三月，从舟山视察部队回南京，路经上海，晚上我们初次见面；第二次是七五年一军和二十军调防路过上海，王秀珍请我吃过一顿饭；第三次就是七六年八月八日晚和九月三日晚的两次谈话。在这前后，我们既没有工作上的联系，也没有任何书信、电话及私人交往。九月六日接到毛主席病重的电报，要我返宁，我去市委告别，如有谋反之意，

这是密谋的最好时机，可我只告别一声就走了。从那以后，没有和他们发生任何联系，请组织详细调查我这一个多月的活动情况（从九月三日到十月八日）。

粉碎“四人帮”，我才认清了马、徐、王的真面目：他们蓄谋叛乱，早就狠抓上海民兵多次发枪。马、徐、王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武装叛乱，搞武装叛乱是他们反革命思想本质的大暴露，怎能无端归罪于我的一两次谈话受我的影响呢？反革命分子马、徐、王的口供决不可信，他们为减轻罪责，妄图嫁祸于我，这就是他们的目的。

总检察院、法院的三名干部在八二年六月审理我的问题时，不听我叙述的事实，而相信马、徐、王的口供，他们说：“毛主席说审查干部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你的问题虽没别的证据，而马、徐、王的口供就是证据。”

请组织相信一个老红军战士的自白，绝不要轻信马、徐、王造反派的为减轻罪责，而嫁祸于我的假口供。

我今年已七十二岁，去年摔伤后三次住院近况不佳，身体很虚弱。承受“反革命分子”的精神枷锁，殃及家属孩子。更痛苦的是多次申诉，无人受理，给组织的信，都石沉大海，我越来越感到生命危在旦夕，渴望在瞑目以前能得到党组织的关怀与过问。让我去北京澄清自己的问题，并盼望解决我目前生活上的困境，党虽在组织上处理了我，可我仍坚定不移地相信党，依靠党，相信党会实事求是地解决我的问题。

~~~~~

#### 【当事者说】

聂元梓口述历史（选载）

• 聂元梓 •

◇ 几个问题，真想问问毛主席

文化大革命越是向前发展，我的不理解就越多。

在那时，我头脑中已经有一些想法。一个是怎样区分和对待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毛主席专门讲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即使是在“文革”期间，他也总是说现在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可是文革中实际定性处理的大量的敌我矛盾问题，这是怎么一回事？还有，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延安整风的时候是必学文件，现在成了“黑修养”，这怎么解释？第三个问号是，跟毛主席当年一块儿搞革命的人，现在都成了坏人了，毛主席怎么过去就没有发现他们一点儿问题？第四，还有，在1966年年底，67年初，我就在想，这么大量地整干部，是不是应当？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整干部整得人人自危，毛主席说“抢救运动”是错的，现在这样整干部，比那时候还要严重，数量这么大，面铺得这么宽，这能说是正确的吗？如果搞得不对，这事怎么收拾？“抢救运动”搞错了，说是康生搞的，账算到了康生头上，毛主席出来扭转局面；这一次搞文化大革命，“5.16通知”写得很清楚，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报纸上和中央文件也一直是这么宣传的，若是做对了，那没有问题，若是搞错了，这是谁弄的？谁能收拾这大局？这几个问号，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越想越不明白，可是，我谁都不敢讲啊！

我曾经想过，有机会见到毛主席，我自己悄悄地问问他，看他有什么指示，可是后来也一



直没有问。毛主席上天安门啊，几次接见红卫兵啊，国庆节庆祝活动啊，几次上天安门都有我参加。我多想乘机向毛主席请示啊！当时，开群众大会也好，接见红卫兵也好，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人员，在天安门城楼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时间长了，站累了，人们就到大厅里休息休息。天安门城楼中间有个大厅，大厅两边都有小房间，放着几个小沙发。毛主席一般都坐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他的周围都没有人，没有人走到毛主席身边去，更没有人跟他说话。人们在大厅里出出进进，但是谁也不到主席身边来。总理要是出来进去，就有很多人围着他问话，请示工作。我问总理北大要不要成立校革委会，就是在大厅里问的。可是，毛主席在沙发上休息的时候，不管时间长短，都没有人过去跟他说话。每一次都这样。我鼓足了劲想去问他，关于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问题，关于对待大批老干部的问题，可是一旦到了毛主席身边，就又打退堂鼓了：算了，别问了，毛主席能不知道这些事情？那时候，把毛主席说成了神，我自己也对他产生了很大的敬畏，无法向他提出什么问题了。

到夺权的时候，我正在顶着这股夺权风，我是光联合，不夺权，就是那段时间，我再次起了念头，非常想找个机会问问他。有一次，毛主席找我，不是在大厅里，是在城楼上，他问我，情况怎么样啊？好不好啊？毛主席和我谈话，报纸上还登出这张新闻照片，毛主席因为个子高，在照片上，他正在弯着腰向我问事情。这照片还贴在北大校园里。我那时要是鼓起勇气问问他，把话说出来就好了。鼓了几次勇气都没敢问。也许，我们对他太敬畏了，他身上的灵光圈，把群众和领袖隔开了。

这几个问号，我没有去问他，可是，我的行动上是非常注意的。我是顺着大流走，坚决不出头，不领潮流。人家到处夺权抢权，我就没有去夺。我就是搞大联合。社会上批斗会上又戴高帽子又挂牌子，坐“喷气式”，搞体罚和人身侮辱，我斗陆平，文明讲理，树了个样板，北大就是这么斗。其他的人，我也管不了，北大一万多学生，我哪里能管得住？还有，对北大的教授，我都是尊重他们的，我没有指使任何一个学生去斗哪一个老师，去斗哪一个学生。像季羨林、周一良，在他们最近出版的回忆录中，都说是因为反对我而受到迫害，其实，我对于他们挨整的事，毫无所知。校文革也好，新北大公社也好，不是每件事情都要请示我的，我也不能把北大的每一件事情都抓过来，很多事情都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别人处理的。中央文革，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市大专院校红代会，这有多少头绪，我不可能面面俱到。当然我也做的很不够。我那时候应该是工作做得更主动一点儿，主动地找几个老师，找几个教授，跟他们谈一谈，定定他们的心，那就尽到我的心意了。

#### ◇ 不许辞职

说实在的，“文革”初期，我曾经兴奋过，以为有了真正发表自己的意见，沟通上下级关系的机会，但是，此后的运动发展却使我越来越困惑。到了夺权阶段，尤其是对于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王、关、戚等人产生怀疑，对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产生怀疑以后，我就产生了退下来的想法。我觉得，把那么多老干部统统打倒，群众组织分裂为两派，武斗越打越厉害，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作为北大校文革的主任，自己对许多事情都想不明白，还怎么领导全校师生把运动进行下去？

还有，从这时候开始，我对文化大革命产生了怀疑，对毛主席所信任和重用的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产生了怀疑，我就逐渐不愿意紧跟毛主席了，不愿意把运动搞下去了。

1967年夏天的7、8月间，我去看杨惠文，和杨惠文说了这些想法，想从运动中退出来，不干了。杨惠文说，你别看现在搞得这么乱，毛主席到时候有办法收拾。你要是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他可有办法整你。你要是想退下来，最好是想个办法，生病住院，或者找个地方“猫”起来，最好现在就不要再出面了。讲到她自己，杨惠文说，她现在是被当作“走资派”接

受批斗，反正现在打成“走资派”被批斗的人也不止一个两个，她也不着急。这真是怪事，文化大革命搞了刚刚一年，别人以为我这样正在得势的人物忧心忡忡，杨惠文这样被“打翻在地”的“走资派”反而一身轻松，非个中人不足道也。这正是“文革”的荒谬之处。杨惠文劝我退身避祸，这些话说得都对，可是，那时候我已经是身不由己，欲罢不能，想抽身退出也做不到了。

按照我自己对怎样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到1967年夏天，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该夺的权也都夺了，该回到正常的秩序上来了。1967年7、8月间，我做了学校里两派群众组织联合起来，复课闹革命的工作。虽然我个人尽了很大努力，但是终于没有成功，派性越来越厉害，武斗越打越凶。鉴于全校的局势恶化，全国各地都是群众组织分裂，严重武斗，文化大革命形势十分混乱的情况，我认为这样继续下去，文化大革命发展下去，必然会无法预料其前景。根据我自己的水平和能力，以及根据我对于校文革成员的了解，我们都无法应付即将到来的复杂局面。因此，在此期间的一次校文革常委会议上，我就讲了，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现在，已经远远地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和领导能力，照目前这样的形势，下一步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根本无法预料，我们都没有能力应付那种局面。因此，我要辞去校文革主任的职务，并且建议解散校文革，因为它已经没有能力领导学校的运动了。我提议，我们向毛主席写个报告，说明我们校文革常委的水平和能力都无法胜任领导北大文化大革命运动，因此请求毛主席批准我们自行解散。另外，校文革常委个人自己愿意继续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话，可以选择参加自己拥护的那一派群众组织。我自己是不想干了，我要退下来。

当时，我讲明了自己对形势的判断和要求校文革自行解散的意见以后，校文革常委就有人马上提出反对，有人说我低估了校文革常委的水平和能力，说校文革成立以后，常委们是做了不少工作的。结果，常委们都拥护这种意见，我要求解散校文革的意见没有得到大家的同意。

但是，我还是没有改变主意。接着过了没几天，在中央文革碰头会召开的接见会上，在周总理出席的情况下，我向在座的中央领导和中央文革成员提出，辞去校文革主任的职务，并且提出解散北大校文革的建议。当时，江青首先表示反对，她说，“过去，你是死保校文革，现在人家一攻，你就要求解散校文革，你不想干了，这不行！”当时江青很严厉地训斥我，周总理和别的人都默认了江青的话，没有发表不同意见，我怎么办？我想退下来都不行啊。毛主席肯定过我们的大字报，给我那么大的荣誉，八届十一全会上，是毛主席提出让我负责成立校文革的，我不胜任、不想干了，也不能一甩手就下台，不能随便撂挑子，必须经过请示中央批准。我的党内组织观念要求我必须这样做。既然江青明确表示了态度，周恩来等人也都默认了要我继续当校文革主任的意见，我是身不由己，欲罢不能，只好是继续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沉浮，不可能不犯错误。

在北京市公安局七处预审中，我讲到当时我的这种思想状况，我说，1967年秋季以前，北大校文革所犯的错误，我全部承认，认真检讨，但是，从这次接见会上，江青不准许我辞职，形势所迫，我不想干都不被允许，那么，对这之后发生的许多事情，我不能负责，不能承担责任。因为我明明知道形势越来越复杂越困难，我没有能力应付，所以我请求辞职不干，江青等人还必须要我干，周总理也没有表示任何不同意见，我是被逼无奈，勉为其难，完全没有个人的选择自由，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能对北大校外校内发生的种种不测负责呢？

◇ 蒯大富：骑虎难下啊！

文化大革命就像一个漩涡，把每一个人都卷入其中，而且是一旦卷进去，就变得身不由己了。运动发展的某一阶段，作为个人，可能从中会感到得到了一些利益，因此而积极地参与它，可是，到下一个阶段，当你发现其中充满了险风恶浪，想要退出这漩涡，以躲避灾难降临到自

己身上的时候，你却发现，你无路可退。所谓形势逼人，不到这个时候，就没有真正的体验。

这种欲罢不能的感觉，不但是我有，蒯大富也对我说过，是“骑虎难下”。

那是1968年3月，北大的武斗，从外面调人来搞武斗的阴谋失败了，他们就改变了策略，在北大内部制造武斗。挑动校内的两派打。可是，这样子，武斗的帽子也跟我没有关系。我看的明白。我在北大为了不让学学生参加武斗，还受到了很多指责，受了很大冤枉。

这时候，蒯大富在清华搞武斗搞出了大动作，进入了后来被称为“百日大武斗”的时期。我怕北大的武斗影响了他，怕他误以为北大是我在搞武斗，所以他也在清华大学打武斗。因此，我和红代会的陈良，把蒯大富找到北大来，就在北大的一院二楼上，我们和蒯大富谈话，劝他不要打武斗。蒯大富真是风尘仆仆地来了，像是刚刚从武斗战场下来的样子。我对他说，清华的造反派在全国是很有影响的，“你蒯大富不要在清华搞武斗了。你不要看见北大在搞武斗，你就搞武斗。我告诉你，北大的武斗不是我聂元梓搞起来的，将来我是不会为武斗负责任的。可是，你清华的武斗情况就不一样了，你蒯大富是要负责的。武斗的罪名你是抹不掉的。”这也能看出我对于搞武斗的基本态度。蒯大富的回答是什么呢？他没有明白我所说的话，他说：“现在是骑在老虎背上下不来了，非打不可。”

#### ◇ 校内群众何以分裂

“除隐患”战斗队主要是隐秘地搞王关戚等人的情况，是在小范围里与他们斗争，在大范围中，我们与中央文革江青、陈伯达、王、关、戚及其同伙谢富治等的斗争，则是在校内校外同时地展开的。他们呢，也在处心积虑地对付我们。其中很重要的一着，就是在北大校内制造分裂，挑动武斗，扶植反对校文革、反对我的势力。

中央文革在北京市搞分裂，造成两大派群众组织的对立。首先是从高教部夺权开始，王、关、戚支持师大谭厚兰，地质学院王大宾，支持“地派”，反对北大。北大法律系的学生牛辉林在地质学院王大宾帮助下成立了一个小组织，专门搞分裂，自称他们是真正的造反派，而新北大公社是老保组织。这样，在中央文革和“地派”的支持下，牛辉林等的势力越搞越大，后来从地质学院回到北大。1967年6月5日，牛辉林与陈伯达在北大单独谈话以后，立即成立了新北大“井冈山兵团”。

这时候，逐渐有一些人，一些老师、教授参加了他们的组织。为什么参加呢？因为这正顺应了他们的心理。在任何地方，都会有不同意见，在北大就更是如此，北大历来就是非常活跃，见解纷纭的地方。现在呢，是那些对我不满，对校文革不满的师生员工，见到有人出头反对我，先后投到“井冈山”的旗帜下了。

那些先后参加“井冈山”的，有许多是在运动初期受到冲击和批斗的学生、老师和干部。因为是我带头写了那一张大字报，导致北大在“文革”初期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引发了随后的一系列的批判浪潮。这些人有老教授，有教师、干部子弟、个人历史复杂的人，等等。这是主要的分歧。其次，则是社教运动的后遗症，那些因为陆平倒台而受到牵连的人们，在“文革”初期受到冲击，将他们挨整的缘由归罪于我，到后来，他们也获得了“革命”、“造反”的权利，自然而然地，他们都把怨气归到我这里，认为我的大字报引出来这一连串的结果，使他们吃了苦头。其实，我写大字报的时候，哪里就能想到那么多？那时候随便揪斗，随便地戴高帽子、挂大纸牌子，坐“喷气式”，这些侮辱人格的方式，我是坚决不同意的，发生这些情况，我难以负责。我们开过斗争陆平的大会，事先就是针对当时群众批斗中出现的上述情况，规定了“五不”，不允许罚站，不允许被批判者不得声辩，不允许挂牌子，不允许坐“喷气式”，不允许戴

高帽子。这是我和校文革搞的，就是想树一个样板，让大家都这么做。可是，中央文革不满意，江青批北大太“温”了，挑动群众乱批乱斗。这样一来，局面大乱，乱批乱斗的事情，我哪里能管得了？

还有一些人，本来是和校文革站在一起的，后来也“上山”，参加了“井冈山”。

周培源为什么参加“井冈山”？他本来也是参加了校文革的工作的，1967年3月，担任北大副校长的周培源和教务长崔雄昆等人一起“亮相”，表示与旧的校党委和陆平彻底决裂，愿意在校文革的领导下参加“文化大革命”。其后，他们都参加了学校的行政管理工作。可是，周培源后来又“反戈一击”，参加了“井冈山”。他为什么会这样做？我的推断是，在校文革工作中，他觉得我重用他不够，没有多征求他的意见。他认为我太霸道了，不民主，至于具体的原因，我说不出来。我那时候，思想也不对头。我觉得，凡是跟着牛辉林跑的人，我认为他们就是要跟着王关戚跑，就是要和我作对，和校文革作对。当时我认为，中央文革王、关、戚等人是野心家，是文化大革命的隐患，我反对他们，而你们受他们的挑拨，站在我的对立面反对我，就是削弱了反王、关、戚的力量。反正你们站错了队，谁愿意走你就走，我不去做你的工作。其实，我应该把他们找来，让他们给我提意见，多听取他们的意见，交换一下看法，把矛盾解决了就好了。可是，那时候我的态度是错误的。对于学校里的人员参加那一派，我是谁愿意过去谁过去，我对他们根本不加理睬。你们就是都过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我也不理睬你们。我心里明白，地派是受王关戚支持的，你对我有意见可以提可以改，但是，你站在王关戚一边，反对校文革，反对我，这就是错误的，我决不能拉你们过来。那时候我们是“老保”，是保守派啊！他们给我起外号“老佛爷”，他们在大饭厅门口吊一只鞋子，诬蔑我是“大破鞋”，这样一群人，你周培源就跟着他们走？我是跟中央走的，我错也是错在跟中央的路线了，你周培源跟的是一群乌合之众，是那些搞人身攻击、搞左道旁门的人，你和他们在一起，你自己成了什么人了？你们愿意站队站到哪里就站到哪里，让历史来证明吧。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还有孔繁，原来跟我关系都挺好的，他是哲学系的老师，是一个很正直的人。他本来也是因为给陆平提意见受到陆平排挤的，他还跟我说过，像有些这样搞宗派搞官僚主义的人，苏修要是打进来，一准会跟着苏修跑。他最初也是校文革的负责人，他为什么也分裂出去反对我，我觉得，他是认为我最大的缺点就是不接受别人的意见。还有，运动中，他被学生批斗过，他也许把这笔账记在我头上。其实，学生批斗他，我是制止过的，不过不是公开出面，不是在批斗大会上。我在下面做过工作，但是工作做晚了，没有制止住对他的批斗。还有，学生批斗他，还把批斗会的照片贴在哲学楼前面的布告栏里。这我都是反对的，都是做过工作后撕下来了。但是，我没有跟孔繁直接谈一谈，没有直接让他知道我的态度，因此产生了不必要的误会。我要是直接地和他谈一谈，为学生批斗他向他表示道歉，解释一番就好了。

张恩慈也成了我的反对派。他跟王关戚跟得太紧了。其实，张恩慈的离开学校，杨克明的离开学校，我都给他们帮了很大的忙，给他们开了绿灯。当时学校是不允许他们走的，我这个总支书记明确同意他们走，他们才能调动，我要是阻拦，他们也走不了。但是，文化大革命的确是太复杂了，人们因为各种原因重新组合，而且是分分合合，动荡不已，很多情况都是客观环境造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毛主席说过，在任何地方都有两派，他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毛主席自己主持了中央工作那么久，又有那么高的威望，他都不能不承认他无法把党中央都统一起来，仍然是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何况，我从一个系的党总支书记，到担任校文革的主任，资历、经验和声望都差得很远，进一步而言，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个单位的文化革命委员会，能有多大的权力，我一个校文革的主任，能有多大的权力，在北大，我从来就没有感到能够把全校师生都指挥得动，从来没有过什么“一统天下”。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讲了那么多话，

党中央发布了那么多指示，都是三令五申，还未必能够全面贯彻下去，我这个校文革主任，又有多大能耐？

#### ◇ 陈伯达助产“井冈山”

当然，校内反对派的崛起，更重要的是因为有中央文革王关戚、陈伯达和江青等人的唆使和支持。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67年6月5日，陈伯达对北大发难，对我发难，发表了倾向性鲜明的“6·5”讲话。这天陈伯达到北大来，他到得很早，在大饭厅先见了牛辉林，他们谈了些什么，我们不知道。我和校文革的同志得知陈伯达到了学校，就急忙赶往大饭厅，在饭厅附近遇见陈伯达。陈伯达对我们说，文化大革命是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你们学校越乱越好，你们校文革摇摇欲坠才好呢。他还向群众讲话说，北大是“一潭死水”，“聂元梓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指责，是足以置人于死地的！

于是，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一些群众在巨大的压力下支持不下去，宣布退出“新北大公社”，而反对校文革的对立派则兴高采烈，以为他们得到了中央文革的支持，陈伯达讲话的第二天，几个反对校文革、反对我的群众组织就联合起来，在牛辉林领导下成立了“新北大井冈山兵团”，他们的组织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了许多，拥护校文革的新北大公社，则在这种冲击之下产生了分化。

#### ◇ “整风要先整谢副总理的风”

如果说，陈伯达的“6·5讲话”，是北大“井冈山”的催产剂，那么，谢富治1968年3月的所作所为，就点燃了北大大规模武斗的导火索。

中央文革也好，谢富治也好，他们都是野心勃勃地想在混乱中夺取最大的权力的。我聂元梓成了他们的眼中钉，可是他们又拔不掉。我又不犯错误，不搞别的事情，他们抓不住。越是这样，他们越是着急。李讷从北戴河休养回来，她告诉我，谢富治说，“要拔掉北大这颗钉子。”这句话是李讷亲自对我讲的。是67年夏天李讷对我讲的。

1967年秋天，虽然说王关戚倒台了，可是，我的处境并没有改变，谢富治由幕后走到前台来，成为对付北大的重要角色。分歧越来越清楚，冲突越来越尖锐，我就反击了。

1968年3月下旬，市革委会开会，谢富治在会上讲话说，各级革命委员会都要革命化，为此要先进行整风，各级革委会都要整风，要真正实现“革命化”，市革委会要专门开几天会进行整风（这是当时经党中央提倡的一项活动）。我就在会上讲了，我同意谢富治同志的意见，市革委会需要进行整风。但是，要整风，“首先要整谢副总理的风”；上梁不正下梁歪，要一级一级地从上往下整，先从谢副总理开始。我就把我对谢富治的主要意见讲了几条。听到这话，谢富治气得手都直哆嗦。他没有想到，我会把火烧到他的头上。

我对谢富治，也有一个认识过程。谢富治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并不低，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从资历从职务上来说，都很不错了。但是，他还是紧紧地投靠在江青脚下，投靠在中央文革脚下，别人不用说，在王关戚倒台以前，连对于戚本禹这样的“小字辈”他都是毕恭毕敬。在市革委会讲话，言必称“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我们一定要紧跟江青同志”，还要一一历数中央文革的成员，不厌其烦地重复道，“康老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伯达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的”，“王力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关锋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戚本禹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等等。他还宣布，谁要反对哪一个都不行，都叫他碰得头破血流；中央文革哪一个也不能反，反江青是反革命，反陈伯达是反革命，反王力是反革命，反关锋是反革命，反戚本禹也是反革命……真是令人感到不堪入耳。当时我们正在同王关戚进行斗争，“除隐患”战斗队的活动，动静很大，听了谢富治这样的讲话，我气得手都直发抖！

还有，周景芳在市革委会里搞名堂，我私下里对谢富治讲过好几次，周景芳在市革委会中，设立了一个情报小组，各单位都有耳目，背着市革委会秘密调查各单位的运动情况，和群众组织头头的动态，上报中央文革。这么秘密的事情，我怎么会知道呢？这个小组里，有一个参加市革委会工作的工人，他不愿意跟着周景芳搞特务活动，就把实情告诉了我。我觉得在是革委会里这样搞是不合法的，就对谢富治讲周景芳搞特务活动。谢富治呢，还为周景芳开脱，说周景芳在北京市革委会做了不少工作，你不要反他，等等。我明明是揭发周景芳，让谢富治这么一说，我是反周景芳了。可是，谢富治这话说过去没有多久，就发生了西单商场大武斗。一追查原因，是周景芳指挥西单商场武斗，周景芳暴露出来，所以垮台了，这也不是谢富治把他拿掉的。相反地，事情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谢富治也没有把周景芳活动的罪行公布给市革委会的委员们，他自己更是一句检讨的话也没有。这些都促使我对谢富治产生更深刻的认识，认定他就是中央文革江青那一伙的。

对于王、关、戚，谢富治的态度同样是全力维护和吹捧他们，以致把北京市革委会变成了王、关、戚及其后台中央文革的一个搞阴谋活动的据点。经我多次向谢富治讲王、关、戚等利用北京市革委会进行阴谋活动的情况以后，谢富治仍然一再地为他们做解释和开脱。

后来，谢富治不仅将北京市革委会作为他们活动的据点，还想在要求市属各级革命委员会要经过整风实现革命化和制定各级革委会革命化条例的幌子下，变各级革命委员会也如北京市革委会一样，成为他们活动的据点。因此我在市革委会会议上讲，制定革命化的条例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实现思想革命化。所以，要整风就要首先整谢副总理的风。这样就打乱了他们以革命化的口号下，进行阴谋活动的计划。这样就引发了会议上的冲突，导致市革委会会议矛头一转，出现集中火力批判我的上述情形。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胡海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